

人脈與新聞採集：從社會資本與組織衝突觀點 檢視記者如何建立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

羅玉潔、張錦華**

《摘要》

本論文的問題意識是新聞記者基於倫理考量往往被要求與新聞來源保持一定距離，主要是因為新聞來源常被質疑會採取公關策略來操縱媒體。但是另一方面，新聞記者的工作核心必須建立「人脈」，主動深入採訪，才能發掘真相與監督濫權行為。但新聞記者要如何建立有價值的人脈網絡，並避免造成倫理爭議，則缺乏較深入的理論分析觀點。

本文借用組織研究中組織內部衝突的理論觀點，並整合社會網絡的核心概念為理論架構，訪談十位資深或受同業肯定的財經記者後發現，「消息來源」其實是一個複數的多元概念，而不是單一階層；而且，組織中不同位置的「代理人」利益並不相同，記者因而擁有相當的主動性，可藉由佈線的多元深入，以及建立信任的互動關係，來建立具有新聞價值的人脈網絡，並避免受到單一強勢新聞來源的操控。

以上發現不但對傳統新聞傳播學對兩者關係的觀點提供新的反思，亦作為實務工作者可行的策略性建議。

關鍵詞：社會資本、社會網絡、組織衝突、記者、消息來源

* 本文感謝匿名評審委員及十位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所給予的意見與協助。

** 羅玉潔為美國加州大學組織研究博士班學生。

E-mail: jadelo1229@yahoo.com.tw

張錦華為本文之通訊作者，現任職於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E-mail: cchwa@ntu.edu.tw

一、問題意識

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與互動，是實務上每位新聞工作者每日面對的課題。相信多數新聞工作者都同意，關係的建立不在於數量的多寡，而在於是否夠深入、能夠掌握真正的「關鍵人物」(key person)，而且對方也願意對你透露重要訊息；一位常有獨家表現與一名只能處理每日新聞(daily news)記者的差別，通常就在於此。

不過，現有的新聞與傳播理論多半對這兩者間的關係提出懷疑，而且不同的價值和規範之間又隱含著某種程度的矛盾。例如，新聞傳播教育一方面要求記者不應與消息來源的關係涉入太深，以免喪失獨立自主性；另一方面卻又要求新聞工作者要深入多發掘事實，不應以罐頭新聞或假事件為滿足。那麼，記者到底該如何拿捏與採訪對象之間的交情深淺？太深，怕落入教科書上所諄諄告誡的陷阱；太淺，卻又往往因關係不夠而採訪不到真正有價值的新聞。

新聞學理論質疑記者與新聞來源之間的倫理關係的主因，在於將所謂的「消息來源」或採訪單位視為一群享有既得利益者，他／她們企圖操弄媒體，以製造對其有利的輿論環境(Sigal, 1973; Sachsman, 1976; Walters & Walters, 1992; Shoemaker & Reese, 1991; Hall, et al., 1978)。但實際上真是如此嗎？根據研究者的親身經驗，⁽¹⁾無論不同路線或不同組織，甚至即使是同一組織中不同層級的個人，其利益、關懷或理念都各不相同，甚至可能彼此衝突。從這個角度來看，新聞工作者若想發掘更多元的聲音，如何更加深入採訪單位，找出不同背景、不同利益的消息來源，顯然是關鍵課題。

因此，現有的新聞傳播理論雖然希望記者擺脫消息來源的控制，但是若未能深入的探討所謂「消息來源」的內涵，反而將失去瞭解記者與多元的消息來源之間動態多面的關係，甚至建立正向關係的機會；更遺憾的是，由於未能積極正視新聞來源的多樣性，因此未能提出一套支持

及鼓勵記者主動建立多元的消息來源關係、「選擇」消息來源，從而進行多元或批判性的報導策略。

近年來無論在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管理學或組織研究中，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及網絡研究(social network analysis)都益發受到重視；社會網絡分析的部份核心概念，包括橋樑(bridge)的概念、強關係與弱關係(strong and weak ties)的概念，其實正可為記者與消息來源關係之研究提供另一種取徑。

但新聞傳播領域對這些概念仍相當陌生，目前文獻中上述概念大多應用於創新與傳播方面的研究。事實上，就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而言，實務界所稱的「人脈」，正是一種社會資本和網絡的概念；若將此觀點應用於記者與來源關係之研究，與現有的新聞學觀點最大不同處就在於，前者認為人際關係（當然也包括記者和消息來源的關係）是一種資本，且強關係與弱關係各有其價值，而後者則對此層關係抱著遲疑或質疑之態度，認為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密切關係可能威脅新聞的獨立自主性，記者應與其保持距離以免受到操控。因此，若欲重新審視記者與來源之間的關係，強調記者如何主動建立新聞人脈，以及討論兩者間可能具有的正向價值與倫理意涵，或許可以借用組織社會學中，已累積相當學術研究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論觀點來探討。

然而，僅僅承認記者與來源之關係的多重面向，還不足以解決本文所提出的矛盾－記者如何在深入建立關係之餘，仍能保有其專業自主性，不致被消息來源所提供的單向訊息所牽制？研究者以為，要建立專業自主性的關鍵並不是遠離消息來源，相反的，記者更應該找出不同背景、不同利益的消息來源，發掘更多元的聲音，以制衡單一或高層的官方訊息。因此，要了解什麼是「深入採訪單位」，我們需要的是更完整的理論架構來釐清新聞來源的脈絡，才能判斷並選擇真正有價值的消息來源，藉以得到例行性記者會中探聽不到的訊息。

本文將借用組織研究中關於組織內部衝突(intra-organizational conflict)的理論觀點來發展本文的研究問題。所謂的組織內部衝突雖有

多套理論可解釋，但其主要共通點皆為，組織中的內部成員會因任務不同、位置不同或權力分配不同而有所衝突；本研究中受訪者的採訪單位多為階層化組織，其內部成員必因位階或功能的不同而有理念或利益上的衝突與矛盾，這對該組織而言固然是負面問題，但站在記者的角度來看，這些潛藏的對立或角力正提供了記者掌握多元訊息的機會。舉例而言，若某公營企業爆發弊端，上層階級亟欲封鎖消息，因此，記者不太可能由公關單位或官方發言人之處探得訊息。此時最重要的消息來源多半是中層主管，或因看不慣上級作風，或因平日的業務或利益衝突，或因具有社會正義感，而為記者提供線索。

研究者以為，既有研究對記者和消息來源的結構限制著墨較多，認為記者受其工作性質或文化產製過程的結構所限，難免受到消息來源的操控，也因而對行動者的主動性及可能採取的策略較少論及；即使有少數實證研究提及記者的主動性和策略運用的可能性，也缺乏完整的理論基礎。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三：其一，借用社會網絡與組織衝突的研究成果，與現有的新聞及傳播學理論對話，發掘出記者與來源間關係可能具有的正面意義及倫理意涵。其二，透過實地訪談，找出資深及優秀新聞工作者建立人脈關係的經驗及策略，企圖為新聞工作者提出一套經營消息來源關係具體可行的方法。其三，在理論貢獻方面，本文期能挑戰現有記者與消息來源研究過於強調結構限制的觀點，凸顯行動者的主動性，並開啓傳播研究、組織理論和社會網絡等不同研究傳統之間的對話。

以下將先扼要回顧過去新聞學和傳播理論中對記者與消息來源關係的理論論述及相關研究，評述其不足之處；接下來則將提出社會資本的理論取徑，討論社會資本和網絡的概念，可以如何應用於記者與來源研究的議題上，並發展出本研究的具體研究問題。

二、文獻回顧

在新聞與傳播領域中對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研究上，以往相關研究已累積不少成果。此處將分為四部份加以討論：(1)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模式理論；(2)消息來源的媒體策略與媒介運用常規之研究；(3)新聞媒體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好與偏誤之討論；(4)Stuart Hall 的初級與次級界定者批判論述。

(一) 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模式理論

記者與來源研究最主要的取徑之一，就是依兩者的互動模式來分類，早在 1961 年 Gieber 與 Johnson 便提出三種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模式：對立、同化及交換模式等。後來不少研究進一步指出，記者和消息來源間存在互利互賴的「共生模式」(Davison, 1975; Cook, 1989)。Wolfseld(1991)則對共生關係提出修正，發展出「競爭性的共生」模式，認為兩者之間是一種相互利用又競爭對抗的關係模式。

我國對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模式研究則相對較少。喻靖媛(1994)曾對四位記者進行為期各四天的參與觀察，發現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關係模式可分為幾類；每一類消息來源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和記者的關係也不同。例如，第一類是記者的「第一線消息來源」，這類的消息來源經常提供有用的線索，擁有豐富的資訊，與記者往來頻繁，是記者的主要「衣食父母」。這些消息來源所提供的消息往往不會出現在新聞報導內容中，且消息提供者的職位往往不高，但他們的觀點卻可能影響整個新聞走向。第二類是新聞的詮釋者，通常是第一類來源的高層主管，其主要功能在於確認或詮釋新聞；這類來源通常是報導中的被引述對象，也是最樂於接觸記者的一群。第三類則是突發事件的主角或相關人物，與記者的關係較無常態性，往往因事件而結合、因事件結束而分開。

喻靖媛及臧國仁(1995)的研究則進一步將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分為對立、表面接觸、共生與同化。該文認為，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可能因交往時間拉長而由疏至親，從對立、表面合作、利益共生，逐步

晉級至同化關係；因此，雙方關係愈密切，記者便愈有可能背離傳統專業義理，而將報導內容當成做人情或交朋友的籌碼（臧國仁，1999，頁344-345）。此一研究的假設顯然亦對記者與消息來源間之密切關係對新聞專業自主可能帶來的威脅提出質疑。

（二）消息來源的媒體策略

探討媒體策略的運用是另一種記者與消息來源關係的研究取徑。Shoemaker 與 Reese (1991, pp. 106-107)曾指出，消息來源的常規管道包括：官方手法（如試探汽球、議會聽證會等），公關稿件、記者會、非即時事件（如演說、典禮）。此外，一般單位所發表的公關新聞稿（即一般業界所稱的「通稿」），或一般為促銷商品、宣達政令而舉辦的記者會等，都算是「新聞發布」(press release)的形式(Goff, 1989, p. 5)，也都是消息來源常用的管道。

對於這些媒體策略的成效，Sigal (1973)、Sachsman (1976, p. 58)、Walters & Walters (1992)、Berkowitz & Adams (1990)都曾作過類似研究，文獻上大抵上認為多數新聞內容確實會受到這些公關新聞內容的影響，記者往往因此疏於自行採訪。

Shoemaker & Reese (1991, p. 150, p.192) 則將消息來源影響新聞記者的策略歸納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單純發送可直接被記者所用的訊息；第二種則是建構一種情境，讓記者不自覺地隨之起舞。後者與其說是新聞或公關策略，毋寧說是一種意識型態的動員(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因此，這一類型的研究關懷，也在於質疑新聞記者會受到消息來源的公關策略的影響，而喪失了自主性。

（三）新聞媒體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好與偏誤

新聞媒體如何選擇消息來源？首先，Herbert Gans (1979)指出，記者為迎合截稿時間、提高工作效率、維持新聞可信度，再加上資訊易得

性(availability)與適用性的考量(suitability)，在選擇消息來源時，較為偏好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學者專家等。其中，權力(power)和權威性(authoritiveness)，都是構成易得性與適用性內涵的重要元素。

此外，無論國內或國外研究，均認為受訪者的性別、職業、地區及職級等因素會影響媒體的選擇和角度；媒體常引述及呈現的消息來源，主要是中年男性、都會地區、機構主管或政府官員為主（鄭瑞城、羅文輝，1988；劉蕙苓，1989）。另外，Lo, Cheng & Lee, (1994)也進一步發現，在報導情境中，政府官員、機構主管不但被引述的頻率高，出現的情境也比較有利。

這一類型的研究也呼應前面的討論，也就是新聞記者傾向於選擇具有權力和權威性的消息來源，因此也隱含著對新聞記者專業與獨立性的批判和質疑，同時此一研究取徑也暗示，記者在工作中的結構限制下（時間，版面及新聞性要求等限制），對新聞來源的選取偏好或偏誤幾是無可避免的。這一類型的研究均較忽略記者所可能具有的主動性及策略選擇。

（四）Stuart Hall 的批判觀點：「初級與次級界定者」

從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論的角度來看，媒體在結構上便是社會控制過程的一環，英國文化研究大師 Stuart Hall 的觀點最具代表性。

Hall 等人(1978)曾指出，由於新聞媒體過度且例行性地依賴官方機構的消息，導致這些權威而可靠(accredited)的社會權力菁英成為新聞事件的「初級定義者」(primary definers)，而媒體在這個過程中僅扮演了次級定義者(secondary definers)的角色。因此，媒介在報導過程中往往只是複製了社會中現存的權力結構。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1)媒介機構只是社會權力結構下的次系統，而媒介擁有者本身往往就是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2)媒體受限於時間和空間壓力，發展出一套特定的新聞採集策略，導致其常規化地依賴官方機構；(3)中立、客觀、平衡等專業意理，讓記者們習於尋找可信、權威的發言，通常即是政府部門發

言人、專家等權力結構中的菁英份子。例如，在犯罪新聞中，警察司法部門往往提供了第一手的「初級定義」，記者再加以選擇、引證、詮釋為「次級定義」。官方法定機構的「權威」位置，也讓新聞看來具有公信力和客觀中立（王寓中，1993，頁 67-68）。

但是誠如 Schlesinger 指出，儘管他也支持「優勢理論」，但 Hall 的分析嚴重低估媒體的「潛在開放性」(potential openness)，而其理論過度擴張「初級界定者」組織內部的團結性，過度簡化政治菁英、媒體菁英與政治從屬之間複雜的互動與抵制過程，僅強調消息來源單面向的影響力，忽略了媒體的報導或評論也會影響政治菁英。Schlesinger 因此認為，在某些環境下，媒體仍有可能抵抗權力菁英的定義權(Manning, 2001, p. 14)。

(五) 小結與討論

上述四種研究取徑，讓我們對記者和消息來源關係之瞭解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但也值得重新審視。既有研究取徑除了對兩者的關係提出一些中性的描述和分類外，卻同時也都以質疑的態度，指出記者與來源互動，隱含著採訪單位「操弄」媒體的策略，可能造成喪失新聞獨立自主的後果。因此，記者被視為被動的角色，在其工作性質與整個文化產製過程的結構限制下，不是別無選擇地必須接受新聞來源的餵養，就是隨時可能落入新聞內容或權力結構的圈套。

但上述的研究由於較為強調記者和來源各自的結構限制，不但忽略記者可能具有的主動性，也鮮少討論採訪單位中不同位置的人員如何可能與整體組織產生利益或信念上的衝突，進而從不同角度提供訊息，甚至挑戰既有權力結構。因此，既有研究傾向將新聞來源同質化，視為所謂的既得利益階層，也難以為新聞從業人員提供積極的採訪策略。

這樣的研究觀點與其方法上的限制有關：因為多數研究只分析了「被引述」的、有名有姓的消息來源，卻無法觸及其餘匿名或隱性的消

息來源。因此忽略了記者主動採集多樣新聞的可能，而無法得知這類隱性消息來源處於組織中的何種層級和位置。

但亦有少數研究能夠較深入的觸及此一關鍵問題，喻靖媛(1994)和臺錦屏(1992)的研究即發現：記者最主要的訊息和新聞線索之來源，其實往往是職位不高的隱性或匿名消息來源；此外，多數新聞工作者對公關新聞稿其實並不那麼重視，反而總是會輔以「私人消息來源」為主要資訊管道。這也意味著：記者的主要訊息來源，未必是口徑一致的官方消息，媒體也未必只能淪為既得利益者的發聲工具。可惜接下來循此途徑進行研究者不多，對此一現象也缺乏相關的理論架構，本研究因此企圖對記者的人脈關係和新聞採訪進行更深入的探索，並加強理論部份的討論。

三、社會資本與代理人理論及研究問題

如上一節文獻回顧中所曾提及，現有研究多認為記者的主要消息來源是處於社會上層的權威人物，但實際上並非完全如此。本研究認為，過度強調消息來源的優勢階級地位，可能錯失捕捉記者「衣食父母」真貌的機會。本章將先從組織研究中內部衝突的觀點，試圖提出有別於傳統記者與來源研究的問題，探討組織中不同位置的消息來源，在記者採訪工作中所可能扮演的不同角色，並將由社會資本和網絡研究中的兩個核心概念—「關係強弱」與「橋樑」—發展出第二部份的研究問題，希望能找出記者和消息來源最重要、也最有利的關係模式。

(一) 消息來源是誰？—從組織內部衝突觀點出發

在組織行為(organizational behavior)與組織理論(organizational theory)中，對於組織內部衝突的問題已累積了大量研究成果；儘管有多種不同的理論觀點，研究者多半同意組織內部衝突是無可避免的。以下簡述關於組織內衝突的四種主要理論取徑：古典組織理論(classical organizational theories)，批判管理研究(critical management studies)，制

度學派(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與代理人理論(agency theory)。

1. 古典組織理論：

組織理論大師 Selznick (1943, 1948)對組織內不同單位的衝突有相當深刻的體認；他認為，組織並不是一個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單位；內部不同部門的成員往往對於所屬部門的目標和需求比對整體組織的利益更為重視。March 與 Simon 在其經典著作(1958 / 1993) *Organizations* 也對組織內部衝突的問題多有著墨。他們認為，組織不是一個具有單一目標的理性個體，而是一個不斷進行著各種政治與權力協商的單位，因此組織生活事實上就是協調衝突的過程。由於不同部門對於組織目標的認知不同，對於實際情況也有不同的解讀，因此組織內部衝突是難以避免的。

2. 批判管理研究：

此取徑主要以歐陸學派為主，但近年來在美國亦有不少管理學者開始以馬克思主義或新馬觀點來詮釋組織內衝突的來源。儘管相關論點和關懷的問題相當多元，但此派研究大抵認為，階級的存在與權力分配的不均是組織內部衝突的來源，也因此，凡是此階層化組織便難以避免內部衝突的宿命 (Thompson, 1961; Clegg & Dunkerley, 1977; Clegg, 1979; Rahim, 2000)。根據此一取徑的觀點，管理階層（由其是大型企業組織內的高階經理人）由於其社交圈相互重疊，而利益也與資本家相近，因此易於發展出一套「圈內」的意識形態，不但試圖在公共政策上發揮其影響力，與一般中下層員工或社會團體所關切的議題也往往大相逕庭，因而理念或利益上的衝突在所難免。

3. 制度學派觀點：

稱此取徑為制度學派其實有過於籠統之虞，因為此處所概述的觀點實際上源於兩支思想：古典制度理論(old institutional theory)，與對新制度理論的反思(the reaction to new institutional theory)。不過，其理論核

心都在於強調行動者的主動性(the importance of agency)。此派論點算是對於傳統結構功能社會學的反動，認為後者過於強調環境和結構限制，而忽略了可供行動者運用的策略。這並不是輕忽結構的力量；反之，是正視社會體系中存在不同結構、制度與次文化的事實。由於不同的制度與結構之間必然有矛盾之處，其間的緊張和衝突 其實正為行動者帶來可供利用的機會。行動者固然會受限於所處結構位置，由於任何行動者都面對多重制度和結構，便可能從不同制度或結構之間的矛盾找到可資運用的策略，以增強其行動機會，甚至可能藉以改變主流制度或價值 (Clemens, 1997; Clemens & Cook, 1999; Friedland & Alford, 1991)。此觀點亦可用於組織內部的衝突：組織成員通常都面臨多重制度與規範；除了整體組織的制度性邏輯(institutional logic)之外，還要考量個人利益、家庭價值、社會規範與部門目標，此時不同價值系統間的矛盾就同時創造了衝突與機會。

4. 代理人理論：

經濟學中的代理人理論(agency theory)，⁽²⁾對於組織中不同階級者的利益差異或衝突，亦有相當有趣的觀察。代理人理論現雖已應用於各種不同的組織及人力資源制度的設計及研究，其核心假設其實很簡單：人基本上是自私自利的，且有機會主義(opportunism)的傾向—亦即個人會尋求自我利益滿足的機會。因此，雖然代理人(agency)理論上應為其委託人(principal)的利益而盡心盡力—也就是說，一個企業的員工念茲在茲的理應是其股東、老闆、和整個組織的利益—但實際上，代理人的所做所為卻不見得符合組織的利益。由於代理人本身的利益可能和組織整體利益、或和委託人的利益有所衝突，因此，植基於代理人理論所發展出來的組織管理研究，即在於如何設計理想的監控和報酬制度，好讓代理人的行為能與其委託人的利益一致。不過，即使再完善的監管和報酬制度，當然也難以完全保證利益的一致。

由於媒體的採訪單位通常都是階層化組織，因此組織研究中對組織

內部衝突的觀點應也同樣適用。在採訪單位中，並非人人都認同組織目標，也並非人人都以組織利益為己任，而認知矛盾和利益衝突的情況其實屢見不鮮。但究竟何種位階的代理人較易與組織整體目標產生衝突？從批判管理觀點而言，高階經理人與資本家的利益較為一致，而與勞工對立。另一方面，根據微觀組織行為研究中關於「個人認同」(self identity) 與「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 的研究結果（例如，Ashforth & Mael, 1989），組織中位階愈高者，由於其組織身份愈明顯（相較於其他身份），因此其對組織的認同也愈強。另一方面，策略管理中上層階級(upper echelon) 的研究指出，組織中的管理團隊之組成與其組織本身的結構和型態習習相關，因而要研究一個組織的策略和文化，也往往可由其高階經營團隊的特徵窺知一二（例如，Hambrick & Mason, 1984; Hambrick, Cho & Chen, 1996）。回到本文的研究脈絡，這些研究成果顯示出，採訪單位中位階愈高者，可能對該單位的認同度愈高、利益愈一致，也因此愈不容「出賣」組織；而位階較低者，對組織的整體利益認同度也可能較低。因此，在記者與採訪對象的關係中，我們應該更細緻的區分新聞來源的層級和位置。據此，我們提出第一個研究問題，並期能在對新聞從業人員的訪談中找到答案：

研究問題一：最常提供記者獨家或內幕訊息的，通常屬於何種層級的消息來源？

本小節所引述的組織研究和代理人理論顯示，公關人員、官方發言人等，可能不易成為記者真正的主要消息來源，這正好與一般印象相反。因為這類人物由於被組織賦予發言職權及保護組織的「化妝師」任務，一言一行都受到嚴密監控，因此組織必然控管這些人的對外發言，並設有直接或間接的獎懲制度和誘因。因此一般公關人員、發言人通常傾向報喜不報憂，其所能傳遞的訊息新聞價值往往相當有限。至於高級管員或高階經理人，因其自身與組織的利益較為一致，因此私下對記者散佈不利於該單位的可能性亦較低。

至於組織中的基層員工，在記者採訪過程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為何？根據林南(Lin, 1982; Lin, 2001) 的社會資源理論，社會位置愈高者，所握有的資源愈豐富；就此看來，一般基層員工因所握有的資源和重要訊息有限，似乎不易成為記者的主要消息來源。不過，社會資源理論的核心要旨強調，關鍵在於行動者所握有的「資源」而非「位置」，因此在某些情況下，即使是職位不高的小人物，只要握有特殊資源（例如主管的機要秘書或司機等），仍有可能提供記者重要訊息。

值得一提的是，位居高位者不易成為記者的主要消息來源，可能還有另一個原因。社會資源理論認為，不同位階者之間通常存在一定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也就是說，兩個行動者之間若社會地位或階級差距太大，則較不易建立起直接聯繫。因此，記者要與高層主管或官員建立密切關係，往往存在結構上的限制與困難。至於中階主管或員工，掌握一定的訊息與資源，一般而言，其與組織整體利益的一致性和對組織的認同度，亦不若上層階級強烈，再加上其與上級主管間可能存在的矛盾與衝突，似乎較可能提供記者有價值、不同於官方口徑的訊息。

綜合代理人理論和社會資源理論對組織層級的討論，在此可以進一步提出第二個相關的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二：若一個組織中的層級可依職權(authority)和位階(position)高低畫成一個連續光譜，則在一般情況下，分處光譜不同位置的一般員工、中層主管、公關人員或官方發言人、部會首長或高階主管等，在記者採訪工作中分別扮演何種角色？

(二) 強連帶與弱連帶

當代經濟社會學大師，也是社會網絡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Mark Granovetter 於 1973 年發表的強連帶與弱連帶理論(strong ties and weak ties)已成為網絡研究和社會資本的經典論述之一。Gronovetter (1973)企圖透過實證研究，找出人們如何透過非正式管道（社會關係）獲得工作機會的資訊。結果顯示，人際網絡對於找工作確實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有超過半數的受訪者是藉由人際連帶找到現在的工作。Granovetter 並進一步發現，弱連帶（或稱弱關係）比強連帶（或稱強關係）在獲得工作訊息上更為有用。根據 Granovetter 的論證，強連帶通常是家人、親戚、密友、天天共事的同僚等，而這些關係往往擁有重疊的人際關係和生活圈。在這樣的情況下，強連帶所能帶給一個人的「新」訊息自然非常有限；反之，互動較不頻繁或處於不同工作場域中的人，由於身處不同的生活圈，暴露在不同的資訊管道中，因此比較可能帶來新工作機會的訊息。(Granovetter, 1973, 1974)

Granovetter (1973)認為，在資訊的傳遞上，人際關係和社會網絡確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其中弱連帶又比強連帶更有利於新訊息的獲取及傳佈。也就是說，愈不緊密的關係，愈有可能替行動者帶來額外的資訊及機會。

然而，之後許多學者的研究顯示，關係強弱不見得是資源或社會資本多寡的關鍵；甚至有學者的實證研究指出，在華人社會或特定的社會制度之下，強連帶比弱連帶對行動者本身更有用。因此，Granovetter (1995)後來自己也對弱連帶理論進行了修正；在這次的修正中，他又納入了社會資源的觀點，認為關係的強弱與並非關鍵，重點在於其所含資源的優劣。

在強連帶與弱連帶的爭議中，華裔學者邊燕杰的研究算是證明「在特定情況下，強連帶比弱連帶更為有用」的代表作之一。他於 1988 年在中國大陸的天津市進行訪查，探討在當時由國家機器分配工作的體制下，人們如何運用自己的社會關係來求職。邊燕杰(Bian, 1997)認為，在 80 年代的中國大陸，由於工作是由政府所分配，且決定何人錄用與否的決策過程通常是秘而不宣的，因此關係中所隱含的「影響力」往往比「訊息」對求職者的幫助更大；但由於當時動用私人關係來影響謀職結果是不合法的，一旦被發現，不但求職者可能丟掉工作，分配職務的官員更可能因此身敗名裂。既然影響力的風險和成本如此之高，強連帶

比弱連帶更有可能讓一個人心甘情願地動用其影響力來幫助另一人謀職。

在中國大陸求職市場中運用人際網絡的高風險性，事實上也存在於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中。除了宣傳性新聞與官方消息之外，對消息來源而言，透露任何訊息都是有成本的；尤其是所謂的敏感或內幕消息，例如規劃中的政策、內定的人事異動、銀行內部的壞帳問題、官商掛勾的醜聞等，這些消息通常是對外封鎖的，一旦經由非正式管道私自向記者透露，就得承受極高的風險—例如，可能遭到上級有形無形的懲戒、同儕的壓力，甚至因此飯碗不保都不無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下，消息來源要透露訊息給記者，其成本和風險都相當高。由此可以推論，在觀察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時，「消息的性質」和「透露消息的成本或風險」，是很重要的觀察指標。通稿和內幕消息的價值天差地遠，而採集這兩種消息時所需要的關係緊密程度也可能不同。

至於關係強弱如何定義？Granovetter (1973)當初對關係強度的定義指標是：互動頻率(frequency)、互動強度(intensity)、親密程度(intimacy)和互惠程度(reciprocity)，基本上這四項指標愈高，關係或連帶愈強。其中，前兩項屬於客觀的量化指標，而後兩項屬於主觀的質化指標。不過，他在實際測量上只用了前兩項；後繼研究社會網絡或人際連帶的學者，則多半據此四項發展出同時包含主客觀要素的綜合指標。此外，亦有不少學者以「關係屬性」作為測量指標，例如親戚、朋友、或熟人等屬於強連帶，而一般友人或點頭之交則歸為弱連帶。

本研究則將記者和消息來源關係的強弱，依其特殊性及互動情境加以概念化，包括：互動頻率、方式、場所；是否會在公餘時間聚會；是否會談及私事；是否在心理上把對方當作朋友；以及互信關係的有無及強弱等，亦即同時涵蓋 Granovetter (1973)當初所提的四項指標內涵。據此，我們提出第三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三：記者和主要消息來源之間的連帶型態多半為何？尤其要取得內幕或敏感消息時，何種連帶對新聞採訪較為有利？

(三) 橋樑地位與訊息優勢

Burt (2002, pp. 155-157)依據 Granovetter (1973)的概念，進一步提出著名的結構洞理論。他認為，一個在訊息傳遞上具有效率的網絡，通常是富含「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的。所謂兩個不同的群體之間有結構洞存在，意思是這兩個群體並非緊密聯結，而是大多專注於自己團體中的活動、對另一群體的事情則未參與，亦即兩群人所處理的事務、所擁有的訊息是不一樣的。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若有人同時和此二群體有所聯繫，他便是處於橋樑的位置，同時知道兩邊的訊息和活動，甚至控制訊息的流動，也因此擁有比其他個體更佳的位置優勢及機會。

舉例而言，假設有 A、B 兩個群體，其中 A 群體中的成員之間彼此熟識、B 群體之內的成員也常有互動，但 A 和 B 之間完全沒有往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流通在 A 群和 B 群內部的資訊，都是重覆性訊息 (redundant information)，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訊息。在此情況下，一旦 A 群體中的某位成員 (假設為 a) 和 B 群體中的另一位成員 (假設為 b) 取得接觸，則 a 便比群體內的其他同儕多了一項優勢—他除了所屬群體內的事之外，還可以獲得 B 群體內的訊息。因此，他能為 A 群帶來的，便是非重覆性 (nonredundant) 訊息，而他也因此享有控制兩邊訊息流動的機會。簡言之，占據「橋樑」位置的人，比別人 (即使擁有同樣「數量」的社會關係) 控有更豐富的資訊、享有更大的優勢和更多的機會。

在探討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上，本研究據此推論：記者若能使自己成為聯結不同結構洞的「橋樑」角色，則此記者可能較有機會提升自身的主動性及價值，不僅能夠增進採訪對象對其信任、建立其在路線上的非正式地位和聲望，在採訪新聞時也能更加便利。在此我們提出第四個問題：

研究問題四：能夠為採訪對象提供雙向交流的記者，是否比較能夠建立起自己在採訪路線上的非正式地位，且較容易取得有價值的新聞？

四、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深度訪談法，根據研究需要，訪問十位記者，本研究選擇受訪者有三個主要原則：(1)主跑財經新聞路線的記者，包括總體經濟、金融，或產業消息；(2)從事採訪工作年資至少五年以上，或實務工作上有傑出表現者；(3)限於平面媒體中的「報社」，包括日報及晚報；雜誌、電視及其他性質的媒體工作者則不在樣本選取範圍內。選取原則說明如下。

(一) 為何以財經路線記者作為訪談樣本？

本文研究者之一曾任四年的財經記者，對財經線記者的採訪生態及與消息來源的互動，皆有一定程度的瞭解，訪談時也能夠獲得較接近真實的資料。此外，財經路線涵蓋了公家機關（包括政府部門及公營企業）和民營組織（包括不同的產業及工會），因此要研究記者與來源關係時，財經路線可謂相當具有代表性，亦可捕捉其中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二) 為何選擇年資五年以上，或實務工作上有傑出表現者？

既然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概念在於「人際網絡和社會關係是一種資本」，樣本選取亦必須符合此一理論意涵。此外，本研究也希望能為有志於新聞工作者提供一些在建立人脈上的策略性建議。因此以資深或受同業肯定的記者為訪談樣本，顯然比年資短淺、或無特殊表現的記者更加貼近本文研究目的。

至於「有傑出表現者」如何定義？所謂的「傑出」雖難有客觀或量化指標，但由於在新聞圈裡，同一條路線的記者彼此間常有互動機會，同業之間對於彼此的功力、操守、勤惰和專業素養等，通常都心知肚明。因此，這些無形的評價在新聞圈中卻相當清楚。本研究所稱的「傑出記者」之選取依據，除了參考「同業之間的聲望、評價」之外，也以「是

否曾被同業挖角」（這代表同業對其專業能力的肯定）、「是否曾得過專業或社內獎項」等兩項指標來界定。

（三）為何本研究樣本僅限於平面媒體中的報社記者？

不同性質的媒體，其工作型態、內容與需求均有極大差別，與消息來源的關係亦大不相同。例如，電視台記者在時間限制下，對新聞的深度和獨特性通常較不重視，也往往無暇、毋需與消息來源建立太深入的關係。然而，報社記者因為每日比報和獨家新聞的壓力，對採訪單位和人脈的耕耘通常較為重視；再加上報紙可以引述匿名消息來源的特性，消息來源較能暢所欲言，因此報社記者和消息來源的關係往往有較深入的面向可以捕捉。

研究者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中至六月底之間，對十位財經路線的記者進行深度訪談，每次訪談平均約持續一個多小時。在受訪者同意下，以錄音方式進行；受訪者亦對本研究的目的與性質有所瞭解，並同意引述。在十位受訪者之中，僅三位跑線年資不到五年（其中代號為 D 的受訪者跑線一年多、G 是三年半、J 則將近五年），其餘則均有七年以上的資歷，最資深的三位跑新聞年資均達十五年以上。在較資淺的三位受訪者中，儘管其主跑財經新聞時間相對較短，但在擔任記者前亦曾任報社其他職務，對於新聞價值、新聞處理和人脈耕耘皆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因此年資雖短，實務表現仍符合本研究樣本選取的標準。其中部份雖曾換過服務的媒體，但多數自「出道」以來都一直擔任財經記者（受訪者 A、B、J 除外），但即使其間路線有所調整，也多與原先的主線有高度重疊或相關；換言之，本研究的受訪者幾乎都是同條路線中記者同業間的意見領袖之一。

五、研究發現

（一）研究問題一：最常提供記者獨家或內幕訊息的，通常屬於何種層級的消息來源？

多數受訪者表示，其「主要消息來源」，或者「願意提供內幕訊息的消息來源」，是機構中的高級、中級或基層主管，而通常不會是最高或最低層級者。

例如，受訪者 E 在被問到主要消息來源的職級時，馬上回答：「當然是中階主管啊！銀行的經理、副理、科長…。像總經理和董事會的人，這種 level 的也有啦，但比較少，他們太忙了，平常很難找，也沒空跟你聊太多」。受訪者 D 則說，「財政部官員保守得很，官位愈大愈怕事，就算好不容易開口也是講得很空洞…有時候職位低一點的反而比較會講真話」。

受訪者 G 也談到了他自己的一位重要消息來源「L 君」。L 君在金融檢查單位任職；雖非主管職級，但卻參與過不少第一線金檢任務。G 說，「他雖然官小，但卻是我那段時間最重要的消息來源之一呢！好多大新聞都是他的功勞，像是重建基金要接管某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或某某銀行，或是某重要金融單位不當配合政令等，都是他主動告訴我的，讓我好幾次上了頭版頭」。

當然，主要消息來源來自光譜兩端的也不是沒有，但這通常是在相當特殊的情況下。關於高層受訪對象成為主要消息來源的情況，請參見下一小節的討論。至於基層員工，若其剛好負責特別職務或對業務特別嫻熟或人脈特別廣，也有可能提供記者重要線索，如受訪者 C 所說：「司機也很重要，他們都知道老闆的行程，而且司機和司機之間平常聚在一起八掛很多的…這些人平常不太受尊重，所以只要你對他們客氣一點、請他們喝個什麼，他們會很感激你的，也會跟你聊很多八卦，你無形間就知道很多事情」。

此外，多數受訪者也表示，由於自己的主要消息來源通常未被賦予對外發言權，因此多半都以匿名形式處理；尤其當其提供的是內幕或敏感訊息時，記者在處理上更為小心，多半刻意不讓其曝光。也就是說，這些消息來源通常都是隱性、不會在報導內文中出現的人物。

根據本段的訪談內容，不難發現，多數記者真正的衣食父母，或是較可能提供其內幕訊息的消息來源，往往不是組織中最高層級的人物，而是中層主管；有時甚至可能是主管的幕僚、承辦人員或司機、秘書等不起眼的小人物。此外，這些主要消息來源通常也不是經常在報章雜誌上露臉或在報導中被引述的人，而是不會曝光的消息來源。這部份的討論除了回答研究問題一，亦可為研究問題二提供部份答案。

(二) 研究問題二：分處組織層級光譜不同位置者，在記者採訪工作中分別扮演何種角色？

除了上文所討論的「主要」、「內幕」消息來源之外，其他型態或層級的消息來源，又具有何種特徵和功能？本小節將探討高階主管或部會首長，以及公關人員和官方發言人在記者採訪生涯中的角色及功能。

1. 高層主管

受訪者認為，高層主管不易成為主要消息來源，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高層採訪對象比較忙也比較不好找，也因此難以建立深入關係；如受訪者 D 所說，「如果不是重要的事或很熟的記者，對方根本不會理你，電話回都不回」。

第二，高層首長往往因其身份和職位的關係，和該任職機構或組織的立場或利益較為一致，因此在某些議題上的談話也比較不為記者所信任。正如受訪者 G 所說的，「他們就代表那個組織啊！怎麼會跟記者說不利於自己公司或單位的話？要問這種東西（比較敏感或負面的消息），還是找其他人比較準吧」。

第三，高層主管不見得對實際業務或執行細節瞭若指掌。受訪者 J 則說，「像銀行業務那麼多種又那麼細，總經理不可能都知道」。受訪者 H 則提到了另一種角度：「大部份的人都是報喜不報憂吧！有些問題層層報上去，可能到一個層級就停住了，最上面的人根本不會知道」。

至於這些高階人士所扮演的角色，有七位受訪者都認為，這些人雖不會是主要消息來源，但畢竟是檯面上的人物，因此通常是在有了新聞線索、或資料已蒐集得差不多之後，進行最後查證時的採訪對象。就像 J 所說的，「我通常都是在求證什麼事的時候，才會去找高層主管…雖然他們不一定會說真話，可是碰到重要的事，還是要有『官方說法』」。

受訪者 I 也表示，「一開始就問高層，一定問不出什麼來的啦！…重要的新聞或是大獨家，我都是先『養』，養個半年一年都有可能…慢慢蒐集資料，多方打聽，掌握的差不多了，等時機成熟，最後才去問最上面的人，也等於給他們一個平衡的機會…如果你真的都已經清楚狀況，他們也曉得騙不了你」。

不過，如前所述，如果和高層首長或主管有特別的私交，在某些狀況下，仍有可能成為自己的主要消息來源。例如，C 在談到某個消息來源時就說，「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是小官，那時大家都還年輕，也比較單純…後來他升得很快，爬到次長的位置…我們還當彼此是朋友，他也只接我電話…」。受訪者 F 亦有類似經驗，但他也認為，除了老記者較可能與高層採訪對象建立這種「一起長大」的革命情感之外，一般記者鮮少有機會與高層主管建立密切關係，更不可能從高層採訪對象獲得敏感訊息。

2. 公關人員、新聞聯繫人與官方發言人

現代多數大企業、組織或政府單位都會設置公共關係或新聞聯繫的單位，主要職務通常包括：舉辦記者會、發布新聞稿、負責聯繫媒體，以及與媒體的溝通等。可以說，其職責所在就是幫所屬單位「隱惡揚善」。即使部份公關從業人員是由記者轉業，對媒體需求可能較為瞭解，但受其職位所限，往往無法完全配合記者要求，更不能暢所欲言；即使有心幫忙，一般對業務訊息亦無深入瞭解。

當被問及「公關或新聞聯絡人會不會成為您的主要消息來源」時，十位受訪者中有八位認為不會；其中更有三位強調「從來不會或絕對不

會」。就像 J 所說的，「如果公關對業務非常熟，那就可能會有用…但通常他們都不太懂，所以大部份的時候我都不會找他們」。受訪者 I 則明快地表示，「我跑新聞從來不靠公關」。

受訪者 F 也有類似的回答：「我覺得參加記者會、拿新聞稿根本是浪費時間」。受訪者 A 則表示，「很多公關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問到新聞他們就沒辦法了…也不是說他們不願意（幫你），但是他們的工作就是不允許他們這樣，不然他老闆花錢雇他做什麼？而且我覺得國內（政府單位或企業）好像不太重視公關，很多事他們都不曉得，就算他真的想幫你，也沒辦法…頂多請他們幫你找人（安排採訪）吧！」

大型組織通常也設有「官方發言人」的制度，由高層主管兼任，並賦予其正式的發言權限，以代表整個組織的立場。因此，這類發言人的「權威性」通常沒有問題，也常媒體上露臉。但依筆者的訪談結果，這類採訪對象往往不會提供內幕或獨家訊息，對記者而言，其「功能」通常不外求證、確認或平衡，有點類似高階主管或部會首長的角色。

有六位受訪者都提到，即使知道發言人不會講什麼「有營養」的內容，還是必須採訪他們，因為他們至少代表該單位的立場；就像 D 說的，「你寫人家的負面新聞，總不能不給人家一個解釋或澄清的機會吧！」C、E、F 則強調，政策面或有重大影響的消息還是必須探詢官方立場，否則不但有失公允，一旦遭到採訪單位公開否認，自己也很難看。

由以上討論可知，記者通常是從其他管道得知訊息、蒐集資訊，等到掌握大致情況之後，最後才是向發言人或高層主管求證或確認，也等於是給「官方說法」一個平衡報導的機會。至於公關人員，對記者來說亦只是聯繫和發布新聞稿的角色。因此，這類層級的消息來源可能是「不可或缺」的消息來源，但是通常不會是記者最倚重的主要消息來源，亦鮮少能提供內幕訊息。研究問題三則將繼續深入討論，當記者採訪內幕消息時，是透過何種社會網絡？

(三) 研究問題三：記者和主要消息來源之間的連帶型態多半為何？何種連帶對採訪內幕或敏感消息較為有利？

1. 與主要消息來源的關係強弱及互動

此處主要是以互動的頻率、互動的方式和場合、是否會在公餘時聚會、是否會談私事、是否在心理上視對方為朋友等，來檢視記者與其「主要」消息來源關係（連帶）的強弱。多數受訪者都表示，在大部份的情況下，和「主要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是「像朋友一樣」，聊天的內容也不僅限於公事。此外，雙方互動的場合也多半不是在公開場合，⁽⁴⁾而是透過電話聯繫，或親赴對方辦公室拜訪。至於是否會在「上班時間以外的時間」（如周末假日）互動，在本研究樣本中會與不會的比率約是各占一半。大體而言，多數受訪者和主要消息來源的關係顯然都屬於強連帶。

受訪者 F 說，和許多消息來源都像老朋友一樣，「聽說誰升官了，我都會打個電話給他們；有時一起吃飯，他們知道我喜歡喝什麼酒，都會帶酒來…我兒子出生的時候，他們也真心替我高興」。

受訪者也提到，和消息來源保持密切關係的確有助於新聞線索的蒐集及採訪。以受訪者 B 為例，「如果是我主要的消息來源的話，我大概每周至少會『請安』兩次…其實也不一定是為了問新聞啊！建立感情也不錯，畢竟見面三分情嘛！下次真的有事要問的時候，他就會比較願意跟你講了」。

受訪者 A 則舉例說：「央行是超級保守的單位，可是有一個官員，我因為跟她私交不錯，她常會打破慣例告訴我一些東西…像一次理監事會前一天，我問她會不會降息，她沒有正面回應，但是她說『以我在央行這麼多年的經驗，我覺得會降』。後來，真的就降了！這件事我印象深刻，因為央行官員通常是避談這種事的」。

受訪者 C 則常和熟識的採訪對象私下聚會：「如果都可以一起在假日出去運動、爬山，那根本就是朋友了啊！問新聞當然很方便…他也不

好意思不告訴你…就算他自己不知道，也會想辦法幫你問到，然後再通知你」。

2. 與主要消息來源之間的信任

「信任」是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多位受訪者提到，「過去互動的經驗」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前提，且「高度信任」通常是存在其與主要消息來源的關係中的：互動頻繁、關係密切，信任的程度也會提升。此外，記者的專業素養和處理新聞的公正性也是讓消息來源產生信任的重要因素，但這也需要長期的觀察或互動。最重要的，信任的確有助於內幕新聞的採集，讓消息來源能放心透露訊息。

受訪者 G 表示，她幾位重要的「獨家消息來源」，幾乎都是長期互動、且擁有一定交情的採訪對象：「他們為什麼願意講真話？…一定是他信任你嘛！…像我有一個消息來源，是銀行總行的副理，他就很信任我，因為我們互動過很多次…後來，每次打電話給他，他都有問必答…像有一次某家大公司的貸款，他們家是（聯貸）主辦行，我問他們的額度和往來情況，他自己不太清楚，還幫我去問他同事…其實像這種事，銀行都很敏感的啦！尤其是這種有官股血統的行庫，他們要是不認識你，一通電話打去問，人家怕都怕得要死，怎麼可能跟你講實話…除非你們本來就很熟…」。

受訪者 G 也說，「我很多消息來源，我知道他們是只會跟我說的，別人去問他們不見得講…像某家銀行的經理，有次私下聊天他跟我說，『我如果對不認識的記者，我是不會跟他說真話的；大家都怕被寫死、都要保住烏紗帽呀！…記者如果要知道實話，就應該要勤跑…要讓你的採訪對象信任才行』」。

值得注意的是，部份受訪者提到，很多消息來源會因看不慣上級或其他單位的作風或政策，或是基於義憤或道德理念，而在「信任記者」的前提下揭露內幕。例如受訪者 H：

每個單位一定都有些可愛的人…像當年的山老鼠事件，當年黃大洲（台北市長）想推行綠化政策，每年都從宜蘭、台東等其他縣市買來好幾百萬顆樹移植過來，可是這樣亂砍一定會影響水土保持，以鄰為壑是不對的嘛！…這商機這麼大，很多所謂的「山老鼠」就私自砍樹來賣…當年市政府的人告訴我時雖然壓力很大，因為告訴媒體就等於擋人財路，但他們也真的看不下去…所以說任何機關都有些正義之士…如果有一天你問到他們，剛好他們又能信任你，就可能透過你揭發一些事情，弊案就爆發出來了。

根據以上討論，研究問題三已可大致得到回答。具有信任特徵的強連帶，的確是多數受訪者與主要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特徵。從受訪者的回答中可以看出，記者們和能夠提供獨家訊息的主要消息來源，幾乎都保有密切的互動和強烈的互信基礎。此外，代理人的角色與機構利益確實不盡相同，甚至代理人還有可能成為揭弊的批判者，顯示以往新聞傳播理論的假設確有不足之處，因為新聞來源並不必然都代表官方權威。同時，與不同層級的新聞來源發展較深入而信任的關係，才是發揮記者深入報導和監督權力機制的關鍵性因素。

（四）研究問題四：記者如何主動的建立自己的人際網絡價值？

談到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交流，一般都認為記者是「被動」接收消息來源所提供的服務；實際上，經過訪談之後，研究者發現，記者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主動性，協助不同採訪單位間的訊息的互通，同時，建立自己的價值，也更易取得有價值的新聞。這種建構策略性位置的主動性，也是 Burt 結構洞理論(1992, 2000, 2002)的核心。

依據訪談這些財經記者的資料，記者往往可以提供政府和業者之間的「雙向交流」，其模式可以整理成以下四類：

1. 某項新政策或新法令即將實施前，記者替民間業者詢問主管機關對於該政策或法規的確切解釋。

2. 某項新政策或法規上路一段時間之後，記者幫政府單位瞭解民間或業界對該政策或法令的態度、反應及心聲等。

3. 記者針對特定議題，幫業者瞭解主管機關對該議題所持態度。

4. 在業者或民眾有特定困擾、卻又下情難以上達的情況下，記者擔任主管機關和民間的溝通橋樑，協助傳達民間或業界心聲。

以受訪者 F 的談話為例：

我跑到後來，很多採訪對象都會問我的意見…之前我跟某個官員（私交）很好，每次有重大政策要執行前他都會問我的意見…做下去之後他也會有事沒事找我聊聊，看看外面反應怎麼樣，因為他知道我很清楚工商界的看法，還有一次開玩笑叫我乾脆不要跑新聞了，來當他的幕僚…我覺得記者就應該當到這樣，就是你的採訪對象都會尊重你，或者問你對政策的看法…我在路線上自然就有自己的地位了。

受訪者 E 也說，他常常替業界的採訪對象幫忙溝通和主管機關之間的問題及代溝，到後來「這樣的記者比較容易樹立你自己的招牌，因為你的功能不只是寫報導…對於跑新聞當然也有幫助，因為這次你幫他們解決一些問題，或問到一些答案，下次人家也比較願意幫你，像是你要問新聞的時候，只要不是不能講的事，他們也樂於提供」。

根據本小節的訪談資料，多數受訪者都有為採訪對象提供雙向交流資訊的經驗，助其瞭解外界反應或上級政策，有助於採訪對象對自己的信任，對於建立在路線上的地位、聲望有正面影響，對於跑新聞也有一定的幫助（雖然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無形、長期的）。當然，這種雙向的交流互動是否會衍生弊端顯然也正是傳統新聞傳播理論所關切的，而如何拿捏專業的分寸，達到建立人脈與持守專業倫理的平衡，亦有待日後更進一步的探討。但不可否認的，記者和消息來源間的

互動間的確有其主動性，且此主動性對於人脈的建立，及敏感新聞的取得有其重要的正向價值。

六、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傳統新聞學和傳播理論對記者與消息來源關係的討論，在倫理的角度上，較偏向批判和質疑的觀點，不是將消息來源視為文化產製過程中較有發言權的一環、具有操控媒體的能力，就是過於強調記者所面臨的結構限制，忽略記者本身所具有的主動性和可行的策略。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取向也傾向將採訪單位視為一個利益統一的組織個體，對組織內部的角力和衝突較少觸及，因而也未曾討論這些利益或理念衝突所可能為記者帶來的機會，及其對於監督權力、發掘多元觀點的可能貢獻。因此，傳統記者與消息來源的研究，多半傾向對記者和採訪對象的關係，採取質疑和防衛的態度。

本研究借用組織研究中內部衝突的觀點，指出在階層化組織中，並非每位成員都以高層組織利益為念，其間亦有衝突與矛盾。若記者能勤於耕耘路線，認識不同層級的消息來源，就可能得到更多元、更全面的消息。因此，「消息來源」其實是一個複數的多元概念，而不是單一結構。對記者而言，一味與消息來源保持距離亦非最佳對策；記者擁有相當的主動性和主控權，可以藉由佈線的多元深入，避免受到單一的新聞來源的既定偏好與偏誤。

本研究的訪談結果顯示，表現較受肯定的財經資深記者幾乎都非依賴公關人員或組織高層提供新聞，而是自行從其他階層的隱性新聞來源管道多方蒐集資訊，最後才請有名有姓的高層發言人做為「證實」或「平衡」的報導角色。這些隱性的消息來源，常是對某些問題親身接觸，卻無法循正常管道揭露；若剛好有記者能夠讓其信任，便可能藉由匿名方式，藉由媒體的力量讓問題訴諸公論。由於這些人往往不是組織中最耀

眼的人物，更不是多數媒體追逐的對象，因此要找到這些可貴的消息來源，便需靠記者勤跑，方有可能。另一方面，要取得這些人的信任，在高風險之下透露內幕訊息，「交情」和「信任」絕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換句話說，在高風險和高成本的訊息交流情況下，具有互信特質的「強連帶」比一般泛泛之交更有助於記者取得內幕訊息。

記者的另一種主動性，表現在「橋樑」地位的展現。不同的採訪單位，就像一個個佈滿結構洞的社會網絡(Burt, 1992, 2000, 2002)，記者因此有機會穿梭於不同的結構洞，進而可以掌握關鍵性的橋樑角色。在本研究中，不少傑出或資深記者都善於運用這樣的角色，強化自己的訊息位置和價值，除了有利於關係的建立、信任的增加外，亦可提高其在採訪線上的非正式地位。當然這種角色也是雙面刃，需要謹慎拿捏，記者必須掌握新聞專業的核心倫理，以公共利益為最高目標，而不是經營個人的私利。由於本研究訪談的均為受到正面評價的資深記者，因此，未能分析負面的個案。如何深化此一倫理的分析，仍有待日後深入研究。

因此，當我們回過頭來檢視既有的新聞傳播學的理论架構時，顯然也有一些新的反思空間。正如同前面指出，新聞來源並非同質的利益團體，記者也不見得都是被動的接受公關稿，或是 Hall 所憂心的“secondary definers”；新聞來源是一個階層多樣化的結構，也是一個充斥不同代理人利益和衝突的結構；記者與新聞來源的關係，並不是單向的，是訊息互惠的，記者也會影響政治菁英。媒體確實有可能抵抗權力菁英的定義權。但是，本研究進一步指出，經營新聞人脈應重視發展信任的互動關係，其是否衝突、對立、或共生，取決於雙方實質的互信基礎，並非形式上的機制。

本文雖欲挑戰既有傳播研究中消息來源操控論的部份觀點，但並無意否定既有研究成果。研究者以為，既有文獻中對於新聞獨立自主性和專業倫理的考量殊為可貴，也是對於新聞工作者的重要提醒；但正因為過去研究對於消息來源所享有的優勢和霸權太過重視，以致於落入結構論的理论陷阱，忽略了記者與來源在結構限制下所能運用的主動性和諸

多策略(agency under constraints)。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對於組織內部的衝突現象亦較少著墨，忽略許多隱性的重要消息來源，因而對於這些重要來源在組織權力架構中的位置及其所代表的意見無法深入探究。雖已有部份文獻觸及此一問題，探討匿名消息來源的特性及與記者的互動，但仍缺乏系統性的理論觀點來分析相關現象。本研究因此致力於突破此一理論上的限制，借用組織研究及經濟社會學中的網絡研究成果來重新審視記者與來源的關係，討論記者欲突破結構限制或採訪封鎖所可採行的策略，並藉由訪談資料發展出具體可行的建議。

本研究對新聞工作者的實務建議是，對於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毋需刻意迴避，「交情好」不代表會「被控制」。優秀的記者必須建立互動密切而「信任」的關係，勤於耕耘多元的新聞來源脈絡，才能取得風險與代價高昂的內幕消息，跳出官方口徑的操控，發揮監督和守望者的記者天職。

從另一角度來看，本文對於組織研究和社會資本理論亦有理論和實證上的貢獻。組織理論和組織行為學領域雖已累積大量關於內部衝突的研究成果，但迄今相關研究所關懷的層面仍僅限於組織內部關係，對於這些內部衝突如何影響組織的對外關係（例如政府部門或民間企業，法人等與媒體之間的關係）瞭解相當有限，而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觀點正可彌補此一空缺。例如，欲瞭解組織內衝突或角力如何影響該組織的公關策略、媒體關係、保密政策等，本文結合傳播研究、社會網絡及組織研究的取徑亦為相關問題提供了一套可供參考的分析架構。另一方面，社會網絡研究中對於不同關係的優劣與功能始終有許多爭辯；由於「人際關係」具有多種面向，學界對於究竟該著重於關係的強度（強連帶或弱連帶）、關係的性質（是否為橋樑性關係，是否具有信任或互惠特質等），或亦是連絡人所擁有的資源優劣等，仍有許多分歧。

記者與消息來源間之關係屬於一種特殊的人際關係，而本文的研究發現與結論，正可為上述爭議提供另一思考面向：記者與來源的關係間隱含著高風險與高成本，消息來源對記者透露訊息須背負著受到組織懲

治的危險，而記者亦須付出大量時間與精力來深掘與維繫其人脈。這種高風險與高成本的特質，使得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必須」具有足夠的信任，方能使後者安心暢言，也因此具有信任特徵的強連帶比蜻蜓點水式的弱連帶在新聞採集上更有價值。至於此一假設是否能在大部份的記者與來源關係的情境成立，則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二)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並非企圖描繪出記者與消息來源間互動的「通則」，而是希望藉不同的理論取徑來分析採訪單位中的多元生態，為有志於新聞工作者提供一套值得參考的規範性策略，討論最有利於新聞採集的關係建立模式。研究結果除了發現新聞來源是一個多元階層，值得記者更細緻的勤快耕耘，藉以得到不同角度的消息之外，也同時發現「信任」與強連帶關係的重要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以信任為特徵的強連帶關係也會有不同的型態，且其建立模式亦大異其趣，與記者本身的年資、採訪同一路線的時間長短、其所代表的媒體之聲譽及規模，及採訪對象的人格特質等都可能有關；究竟何種結構或個人限制會如何影響記者與來源之間的連帶型態，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索。此外，在樣本選取上，本文為了捕捉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深入關係，因此僅以報社的文字記者為主，而未涉及雜誌、電視、廣播及網路媒體。訪談樣本僅涵蓋財經路線，其他如政治、社會、藝文等路線的記者和採訪對象互動生態，在本研究中也未能觸及。即使在報社記者中，本研究也僅以財經線上的資深且具有相當領導地位的記者為主，也就是其新聞處理和專業操守都受到同業及社內肯定的優秀或資深記者。這種訪談策略，固然能發掘成功的模式，但也因此無法觀察到「失敗者」的人際網絡特質。

本文的另一項主要限制，在於其研究範疇。由於本研究所關懷的問題是如何藉由人脈耕耘來強化記者監督守望者的角色，並在採訪單位內部的既有矛盾與衝突間培養有利於新聞採集的社會網絡，以便於高成本的內幕或敏感新聞的取得，因此對於一般例行性新聞的處理及所需人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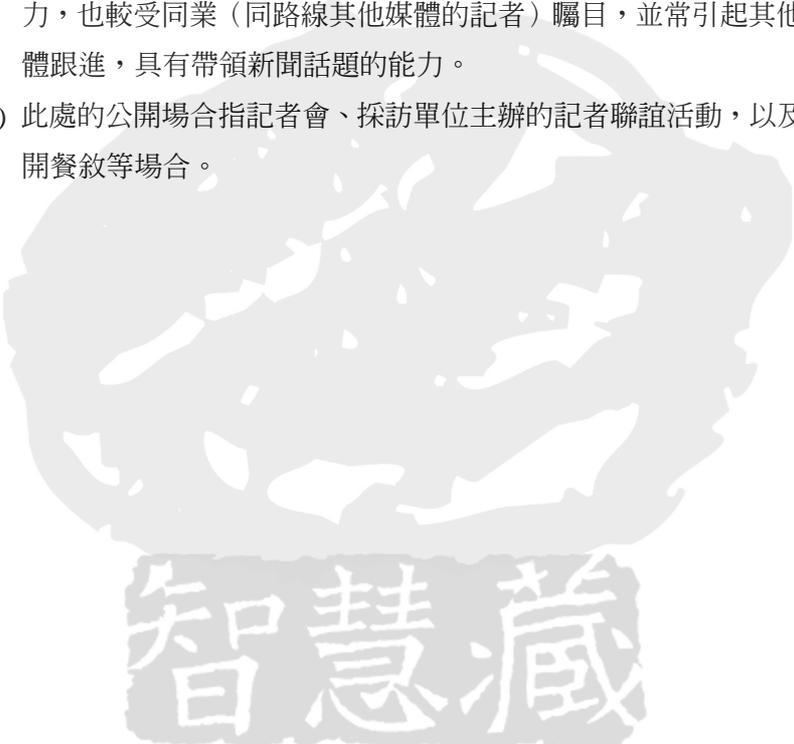
較無討論。研究者並非忽視例行新聞的重要性，亦無意否定與公關或官方發言單位維繫關係的重要性，只是本文意在補強既有研究的不足，著重在對內幕新聞與隱性消息來源的探索，因此在研究問題與訪談樣本的選取上需有所取捨。此外，為使研究問題更清楚的聚焦，本文的研究問題多半是由新聞工作者的角度出發，訪談樣本亦全為記者。後續研究若能由消息來源的觀點切入，甚至對組織中不同層級的訊息來源進行訪談，當能提供更有趣的觀察，亦能對本研究提出的論點進行較為完整的檢驗。

最後，本文雖一再強調具有信任特質的強連帶關係有助於新聞採集，並凸顯組織內部的利益衝突或理念矛盾有助於記者發掘不同角度的聲音，避免受到單一強勢來源的控制，這雖然也具有倫理意義，但並不完整。本文尚未能探討記者在建立策略性橋樑地位、或穿梭於組織內外的不同利益小團體之間時，該如何謹慎自處，避免涉入權力紛爭或利益糾葛。但這些問題皆是在新聞採集實務上的重要議題，有待未來研究者再加以深入研究。

智慧藏

註釋

- (1) 研究者之一曾擔任財經記者工作四年。
- (2) 對代理人理論的詳細討論，可參見 Arrow (1985), Eisenhardt (1989), 與 Peterson (1993)。
- (3) 此處所稱的「意見領袖」，指的是新聞在路線上具有可信度和公信力，也較受同業（同路線其他媒體的記者）矚目，並常引起其他媒體跟進，具有帶領新聞話題的能力。
- (4) 此處的公開場合指記者會、採訪單位主辦的記者聯誼活動，以及公開餐敘等場合。



智慧藏

參考文獻

- 喻靖媛、臧國仁(1995)。〈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與新聞處理方式之關聯〉，臧國仁（編），《新聞「學」與「術」的對話 III：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頁 201-236。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 臧國仁(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
- 鄭瑞城、羅文輝(1988)。《電視新聞消息來源人物之背景與呈現方式之研究》。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
- 劉蕙苓(1989)。《報紙消息來源人物之背景與被處理之方式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羅文輝(1995)。〈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向〉，臧國仁（編）《新聞「學」與「術」的對話 III：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頁 15-28。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 臺錦屏(1992)。《政府發布的新聞稿與新聞報導相關性研究：以行政院新聞局、台北市政府新聞處發佈的新聞稿為例》。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Arrow, K. J. (1985). The economics of agency. In J. W. Patt & R. J. Zeckhauser (Eds.), *Principles and agents: The Structure of business* (pp. 37-51).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Ashforth, B. E. & Mael, F. (1989),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the organ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1), 20-39.
- Berkowitz, D. & Adams, D. B. (1990). Information subsidy and agenda-building in local television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67(4), 723-731.
- Bian, Y.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3), 366-385.
- Burt, R.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rt, R. S. (2002). The social capital of structural holes. In M. F. Guillen, R. C. Collins, P. England & M. Meyer (Eds.),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pp. 148-192).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2000).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R. I. Sutton & B. M. Staw (Ed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p. 45-423).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Clegg, S. (1979). *The theory of power and organization*.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Clegg, S. R. & D. Dunkerley. (1977). *Critical issues in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Clemens, E. S. (1997) *The people's lobby: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0-192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lemens, E. S. & Cook, J. M. (1999).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ism: Explaining durabil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441-466.
- Cook, T. E. (1989). *Making laws and making news: Media strategies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 Davison, W. P. (1975). Diplomatic reporting: Rules of the gam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5, 138-146.
- Eisenhardt, K. M. (1989). 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1), 57-74.
- Friedland R., & Alford, R. (1991). Bring society back in: Symbols,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In W. W. Powell & P.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pp. 223-62).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Pantheon.

- Goff, C. F. (Ed.). (1989). *The publicity process* (3rd ed.). Ames: The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Granovetter, M. (1995). Afterword 1994: Reconsiderations and a new agenda. In M. Granovetter (Ed.),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pp. 139-18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4).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1380.
- Hall, S. et al.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London: MacMillan.
- Hambrick, D. C. & Mason, P. A. (1984).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9, 193-206.
- Hambrick, D. C., Cho, T. S. & Chen, M. (1996). The influence of top management team seminar in strategic heterogeneity on firms' competitive mo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1(4), 659-684.
- 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 P. V. Marsden & 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pp.131-145). Beverly Hill, CA: Sage.
- Lo, V. H., Cheng, J. C., & Lee, C. C. (1994). Television news is government news in Taiwan: Patterns of television news sources selection and presentatio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1), 99-110.
- March, J. G., & Simon, H. A. (1958/ 1993).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Manning, P. (2001). *News and news sourc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 Rahim, A. M. (2000). *Managing conflict in organizations*.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 Selznick, P. (1948).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3, 25-35.
- (1943). An approach to a theory of bureau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 47-54.
- Peterson, T. (1993).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Acta Sociologica*, 36(3), 277-293.
- Sachsman, D. B. (1976). Public relations influence on coverage of environment in San Francisco Area. *Journalism Quarterly*, 61(1), 130-140.
- Sigal, L. V. (1973).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Lexington, MA: D. C. Heath & Co.
- Walters, L.M. & Walters, F. N. (1992). Environment of confidence: Daily newspaper use of press release. *Public Research Review*, 18(1), 31-46.
-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1991).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 Spitzer, R. J. (1993). (Eds.). *Media and public policy*. Westport, CN: Praeger.
- Thompson, V. A. (1961). Hierarchy, speci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nflic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4), 485-521.
- Wolfsfeld, G. (1991). Media, protest, and political violence. *Journalism Monographs*, 127, 9-36.

Networks and News: Reexamination on Ties between Reporters and 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and Agency Theory

Yuchieh Lo, Chinhwa Ch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social network, social capital and intra-organizational conflict perspectives to examine an important topic in mass communication fie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urnalists and their news sources. The major findings are: (1) In a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middle-level employees or managers, rather than top executives or official speak persons, are most likely to be journalists' main sources. (2) Strong ties between reporters and sources can facilitate the information flow and help the former get inside news. (3) Reporters themselves can be "bridges", provid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ir sources and hence enhancing their status. (4) Personal ties between reporters and their sources do not necessarily do harm to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ethics; on the contrary, these linkages may be critical to freedom of pres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reporter, journalist, news source, social network, social capital, intra-organizational conflict

* Yuchieh Lo is a Ph.D. student of organization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SA. Chinhwa Chang is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